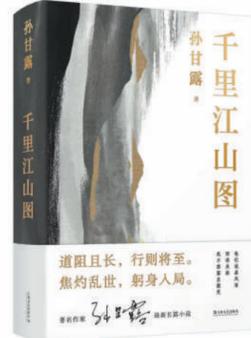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贺绍俊：《千里江山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是宋代画家王希孟的一幅青绿山水画卷，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的真迹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当孙甘露决定写一部反映革命年代中共地下党艰苦斗争的小说时，想到要以“千里江山图”作为小说的名字，一定是从这幅古代名画中找到了与他所要讲述的革命故事之间精神上的共通性。于是，孙甘露在小说中绘就了一幅关于革命历史的《千里江山图》。

小说将我们拉到了八九十年前的大革命时期，1933年初的大上海。往前推十多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并以上海为中心，将革命的火种引向大江南北。但此刻的上海却是寒蝉鸣，革命的重心逐渐从大城市向南方农村转移——这也是中国革命的一次重大战略转移。《千里江山图》讲述的故事便与这次重大战略转移有关。孙甘露只是讲述了其中的一次秘密行动，但这次秘密行动是如此惊心动魄。最终，陈千里带领大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真是水到绝境是飞瀑，无论多么可怕的绝境，也阻止不了一个革命者勇往直前的决心。

然而孙甘露并不是在讲一个传奇，更不是编造一个神话。他是鲁迅先生所期许的“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一方面，他以非常生活化的场景，真实呈现了陈千里及同志们所面临的危险和困境。另一方面，通过缜密的分析和准确的叙述，他令人信服地描写了革命者们是如何以自己的机智和勇气与敌人周旋，从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的。孙甘露出色的小说叙述能力再一次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收敛起自己的精神想象力，就像一名地质勘察员或历史记录者，特别在意叙述对于客观真实的还原度。这不就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应有的姿态吗？然而，孙甘露并未止步于真实呈现一个闯出绝境的革命者的灵魂。他所讲述的故事发人深省，十来位忠诚的革命者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尽管所有的行动都处在敌人高度监视的状态下，尽管身边还暗藏着潜伏的内奸，但他们竟然圆满完成了任务，这真是一个奇迹！这是革命创造的奇迹，是革命激活了人民内心沉睡的火山而喷发出的岩浆。这也就是革命的本质。今天的读者一定会惊叹这真是伟大的奇迹，但对于革命者而言，这就是他们进行革命的常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令人肃然起敬。他们来自不同家庭，干着不同的工作，但用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方卫平的话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愿意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孙甘露非常集中地表现了他们的这一共同点，从这里能够窥见革命者的灵魂。在孙甘露绘就的“千里江山图”里，融入了革命者的身姿和灵魂，融入了革命史的一路风雨。

孙甘露：我想以《千里江山图》这个题目来写一部小说，大概有近20年时间了。真正出现写作的契机，实际上是在一年多前。20世纪30年代初，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的秘密行动，在我看来和这个书名相契合。因为从上海到瑞金的直线距离，大概就1000多里地。但在当时是不能这样走的，它必须绕到香港，从上海、广东汕头再回来。历史上的交通线是这样的，这样走的话就是3000里行程。《千里江山图》的故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候，我父亲随部队南下到了上海，我母亲也是在那个时候来上海的。我出生在上海，一直就在这里生活。我离开上海时间最长的，大概就是到北京去开会，20多天；其他情况都是五六天或十几天，没有长时间地离开过。我在上海的好几处地方都居住生活过。因为我父母在世的时候，我们家随军，跟着我父亲一会儿到这个，一会儿到那儿，因此我对上海有一个非常感性的、直观的了解和认识。书中写到的很多地点，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关键问题在于，我需要把我的经验和历史的材料聚拢起来，使它变成小说的一个部分。这实际上经过了漫长的考虑。

我觉得关于历史的想象也好，历史材料的运用也好，它不是一个越来越多的过程，而是做减法——怎么样越来越精粹。

关于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的笔谈

革命历史的思辨与想象

《千里江山图》最核心的东西讲的是一种信仰的选择、理想的坚守：人们到底是怎样看待他所坚持的信念和道路的？这是对革命历史叙事的思辨和想象。

近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中西古今思潮汇聚，那些风云际会的时代传说，那些风华绝代的人物事迹，以及那些画面斑驳的历史影像，作为秘密战线斗争故事的背景，令人无限遐想。我们有责任去思索历史洪流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瞬间、那些艰难的那些年，想象那些仁人志士的身影如何从晦暗未明的生活场景中逐渐浮现出来，如何迈入那些决定性的时刻，最终成为义无反顾的勇士。

我十分注重对历史素材的运用，使其成为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使环境和人物更为紧密地相互依存，而非单纯地陷入考据式的遐想；从情感出发理解理想信仰在怎样的情境中影响和规范了人物的行为和最终的取舍；从纯粹性的角度看待人物的精神活动如何内嵌于意识形态含义中，避免空泛的说教；从具体而微的历史进程出发，忠实于长程线性逻辑，而非脱离生活经验陷于奇观式的炫技和展览。在准备这部小说的日子里，我获得一个契机，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传统，重新认识外国文学的影响，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

一次对隐蔽战线的回望，也是一次返乡之旅，一次对未来的展望之行。通过小说的叙事旅程，我回溯时代的风貌，通过街巷、饮食、视觉和味觉唤起乡愁和城市的记忆，唤起对奋斗牺牲最深切的缅怀，对大变革时代的拥抱和体悟。我脑海里清晰浮现旗帜飘扬、时钟滴答，一切都迫在眉睫，普通的年轻战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充满危险的旅程。

这部小说涉及了上海、南京、广州3个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一个故事的上卷，如果未来有下部的话，还有一条隐含的复杂线索也许会在武汉这座城市展开。彼时，这幅画卷才会完整地合拢吧。当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这个发生在时代已经逐渐远去，那些隐姓埋名的烈士，那些以假名或者代号出入生死的烈士已经长眠地下。缅怀他们，记述他们的事迹，使其传之久远，这是我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江山千里绵延不息，田野上、城市间劳作的普通人今天擦拭汗渍时，当会心怀感念。

长征

第5605期



沉潜军旅生活之河

■王凯

假日和春节时替战士值班，后来连总机的女兵都知道了这个代号“洞六”的家伙居然是个排长。等我晋升中尉后，又被调到机关任干事，初步掌握了一点写材料的基本功。再后来，我又去连队担任指导员，干干就是4年。4年是大学本科的学习周期，我也像是读了一个关于军队基层专业的本科，掌握了连队生活的所有知识。从最基础的如何在晚点名时讲话、如何主持召开支委会、如何迎接上级工作组检查、如何在菜地和猪圈干活儿，到稍难一点的如何表扬或批评、如何安慰或帮助战士、如何处理矛盾和巩固团结，再到更高阶的如何得到战士们信任、如何让他们愿意吐露各自的心事，以及如何让他们自己在内所有人成为一个荣誉和情感的共同体。关于这种感受，我在中篇小说《沉默的中士》里这样写过：“我刚干指导员的时候，觉得4年的时光漫长得像4个世纪；当我知道自己即将离开的时候，觉得4年短暂得像4秒钟。这是感觉的相对论……连队是一个奇异的组合，一张张命令把一群素不相识的人集合在一起，你必须接受他们，适应他们，融入他们，然后学会爱他们。”也许这些话看上去带点矫情，但我真的就是这样想的。

当然也得承认，那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偶尔也会令我感到疲惫甚至厌倦，但绝大多数时候，这种热气腾腾的集体生活之于我依然是厚实并且可靠的。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4年的连队指导员经历是我此生最为重要的经历之一。那4年是我真正意义上深入军队生活根基的4年，是我拥有了多数人未曾拥有的别样生命体验的4年。如果说军校是我军旅生涯的启蒙，那么连队就是我军人生活的深造。也因此，我几乎所有的小小说都离开连队和生活在其中，而那些普通军人。我熟悉我那个连队里每个人的长处和毛病、相貌和习惯，以及他们睡在哪间宿舍的哪张铺上，谁喜欢蒙着脑袋或者露着脚丫子睡觉，谁

饭量更大或者谁更讨姑娘喜欢。晚点名的时候，我从不看花名册，只消从第一间士兵宿舍的第一张铺开始在脑子里逐个过一遍，他们就都到齐了。换句话说，我的小说写作的确是拜连队生活所赐，没有连队就不可能有我的小说。我的连队就像一片戈壁，支撑或哺育着文学的种子在此生长。如今我离开连队已整整20年，但依然能清楚地回忆起那些属于连队的面孔和细节。它其中有很多都写在了我的小说里，还有一些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有的朋友说我的小说有很浓的军营气息，我想这其实很正常，因为我确实在那里认真地生活过。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资源型”写作者，像个矿工或淘金人，一门心思地挖掘自己经历过的生活。然而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离开连队20年后，这感觉也越来越明显，写得越多，同质化就越严重。有的朋友告诉我，我某篇小说里的某个细节在我另一个小说里也出现过，而我自己都不记得了。这说明我开始捉襟见肘，人不敢出了。一方面是我过往军营生活的资源不可再生，另一方面是军营生活最生动的部分，也就是基层生活已经越来越远。回头看自己的小说时会发现，以前的作品相对会更加情深意长，特别是写连队故事尤其如此，像《沉默的中士》《终将远去》这些小说，自带浓烈的情感，因为那时离开基层时间不长，连队生活的余温犹热，想起来或者写起来时常让我心潮涌动。而现在我却再也写不出这样的故事。后来我明白，我熟悉的那个戈壁滩上的连队在记忆中渐渐被固化，成了一组群雕或者一幅油画，虽然仍然是清晰美好的，但似乎也不能永远这样对着它描摹下去。毕竟生活是不断变化着的水流，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容易陷入刻舟求剑的境地。我曾亲身经历过连队生活无疑是一座矿山，但现在它对人的意义可能需要被重新定



边防踏雪（油画）

郑洪作

整体视域下的微观写实

■牛占龙

的历史展开叙事，以宏阔的历史吞吐、精微的细节呈现、兼具广博和具象的结构方式，大视野、多角度地展现出从清朝至今不同的历史阶段，独龙族人的生活状态和命运际。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比，连缀起独龙族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摆脱数千年苦难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共同迈向伟大复兴之路的壮阔进程。

《独龙春风》题材独特、内容精准、主题突出。作品深情讴歌了独龙族在新时代真实真切、动人感人的“山乡巨变”，细致讲述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独龙族的两次巨大跨越。第一次跨越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迈入社会主义的尊严；第二次跨越是独龙族与其他各族人民一道脱贫致富，迈进小康，奔向乡村振兴。作品通过生动鲜活的人物故事，诠释了“民族一家亲”的真正含义。

《独龙春风》分为上下篇，上篇“春风一度”主要是回顾历史，下篇“春风二度”主要描述的是现实。作

品叙事文字朴素、干净、准确，谋篇布局上又有多样的表现技巧，生动描写了一大批独龙族人的故事，塑造了他们为家乡人民谋幸福的奋斗者形象。如独龙族早期知识分子孔志清，他在旧社会曾为独龙族人民谋求自由幸福四处奔波，但都徒劳无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新中国，担任独龙江区区长，工作尽心尽力。孔志清、高德荣等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显示出作者潘灵、段爱松扎实的文学功底和创作时的精巧构思。作者精准地发现和抓住了人物的特质，通过真实的历史片段和故事细节，充分展示了独龙族人民的家国情怀。

进入新时代，报告文学文体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报告文学对于读者认清、理解、读懂中国的历史走向、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具有不可替代的文体优势。尤其是近年来，围绕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收获了一大批相关题材的大部头报告文学作品，全景式、百科全书式的写法也越来越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回想自己近年来的创作，很多成果都得益于书写基层部队的火热生活，塑造“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崭新形象，紧紧围绕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创造。我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荒野步枪手》，就是在这样的创作理念下，沉潜军旅生活之河的新收获。

2019年11月，我和另外几名创作员前往朱日和训练基地参加一场演习，在隆冬的内蒙古草原上度过了数个难忘的昼夜。那几天，训练场上狂风大作，我们住在演习场的卡车大厢里，夜里外面的最低气温下降到了将近零下20摄氏度。除了狂乱的风和风声中凌乱的思绪，包括肢体、感官和矿泉水在内的一切似乎都被冻结了。尤其是在没有火、没有光也没有手机信号的寒夜，我缩在睡袋里，最大的愿望是能喝上一口热水。回想起来，那应该算得上是我从军30年来最难熬的日子之一。这让我觉得那几天的苦不能白吃，无论如何也得写篇小说出来，于是就写了一部中篇小说《荒野步枪手》。

最初，我只是想写严寒荒原上那几天的困顿和难熬，但动笔之后才发现这并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每个人都会有类似难熬的时刻，而那些印象深刻却又零落散乱的生活碎屑究竟有何意义，这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

遥想当年，我军校毕业刚刚来到某座沙漠边缘的基地工作时，广袤的戈壁大漠正如未来世界一般在我面前徐徐展开。你不知将会遇到什么，但你知道你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崭新生活。彼时的我还是个年轻的空军少尉，刚刚学会如何穿戴防毒面具和防护服，怎样给造型优美、威力惊人的地空导弹加注燃料，以及如何与技术过硬又个性突出的老兵相处，还有如何给大棚收放保温草帘子以呵护好戈壁滩上难得的绿色。当然，还有星星。我认为戈壁夜空里的星河是最为灿烂的，所以这条星河经常在我的小说中出现。有时候我也会想，总是写这地方是不是太单调了，可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比戈壁大漠更适合我小说存放的地方。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当了一段时间技术员后，我还干过一年多的通信排长，每天在几个机房之间跑来跑去，跟着电话班的战士学会了在200门人工总机上接转电话，跟着电台班的战士学会了如何使用电台展开联络，还跟着卫星数据小站的战士学会了五笔字型输入法。我甚至还拥有了一个用于总机值班的专属代号，以便在节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潘灵、段爱松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独龙春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聚焦少数民族独龙族在近代历史，反映了旧社会独龙族艰难困苦的遭际，书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独龙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帮助下，翻身得解放，从原始社会状态直接过渡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创造美好新生活的历史进程。作品题材独特而重大，材料全面而准确，故事生动而感人，将民族史、边地书、民俗志、时代风巧妙地熔于一炉，堪称独龙族历史与现实的“百科全书”，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摆脱贫困、建设小康社会的辉煌历史图景。

整体视域与微观写实相结合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独龙春风》围绕世代生活在西南边陲、极边之地的独龙族